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报告(第7期)



中美竞合下的 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

复旦大学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
2015年4月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简介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于2015年1月18日，该中心由复旦大学牵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作为核心协同单位参与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研究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助力中国的和平崛起，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宏伟事业。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报告

中美竞合下的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

第7期

2015年4月

作者简介

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上海美国学会会员，中美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学者。

主要从事美国国内政治、外交与安全政策及中美关系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政策》、合著《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印太安全布局困境及中国的应对之策研究》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新兴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改革研究》等课题多项。

中美竞合下的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及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展开了某种心照不宣的竞争。夹在中美两个“大块头”之间的澳大利亚，面对中国崛起及中美亚太竞合，对华战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冲战略”特征，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华政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则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并注意加强与日本等地区大国的经济与安全关系以及地区制度建设，提升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空间，确保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

当前亚太地区秩序面临深刻转型。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中国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增长首要引擎及亚太多数经济体最主要贸易伙伴，地区经济影响力显著上升。美国对此忧心忡忡，担心随着实力增长，中国会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地区秩序。两国在亚太地区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竞争关系。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面对中国实力上升和中美竞争加剧，表现出某种矛盾心态：希望继续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又担心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在发展对华经济关系的同时，

希望进一步加深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澳大利亚在对华关系上奉行一种较为精致的“对冲战略”：在积极发展对华政治与经济关系同时，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加强与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的经济与安全关系，并积极参与地区制度建设，最大限度确保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

一、 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与合作

中国及亚洲的整体崛起，推动全球战略重心由传统的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战略争夺的重心。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及利益的拓展，既有地区权力乃至利益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中国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大力推进周边外交，更新外交理念，提出一系列促进地区繁荣与安全的政策倡议，致力于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与命运共同体。美国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挑战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该地区建立的秩序，甚至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见招拆招，“动作不断”，竞争明显加剧。

第一，中美亚太政治影响力竞争。新世纪伊始，我国对周边外交进行了调整，将传统的睦邻政策拓展为睦邻、安邻和富邻，强调亚洲各国在政治上和睦相处、经济上互利合作、安全上互信协作，丰富了周边外交的内涵。¹在次年召开的中

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将周边外交提升到我国总体外交战略的首要地位，明确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全方位外交战略构想。²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周边外交，不仅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还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致力于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网络和培育命运共同体意识。³

美国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东亚地区发起的“魅力攻势”深感忧虑。⁴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全面介入东亚事务，特别是积极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海划界和海洋权益纠纷，将美国扮演成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奥巴马本人及政府高官对东亚地区进行了频繁访问，足迹不仅遍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国，还覆盖了印度、越南、印尼、缅甸等新安全伙伴国及转型国家，拓展美国的政治存在。奥巴马还一改美国政府对东盟等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怀疑态度，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向东盟派驻大使，并于2011年参加了东亚峰会，提升美国在东亚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

第二，中美亚太经济议程设置权竞争。面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急剧上升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加速态势，奥巴马政府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高调抛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贸易倡议，强调美国的“亚太身份”，同时

大打“规则牌”，希望借助“高标准、面向 21 世纪的自由贸易协定”重塑东亚贸易规则，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方向，抵消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提升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存在和经济议程设置能力。中国则看准了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分陆海两翼打通中国与亚太地区（链接至欧洲与非洲）的互联互通，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为亚洲（乃至世界）互联互通提供融资渠道，为亚洲及全球经济发展开辟新的增长点。⁵此外，中国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入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程，提出了构建开放、包容的亚太自贸区（FTAAP）倡议，积极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进程。

第三，中美亚太“安全观”竞争。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和理念归结到一点，就是维护美国的军事优势和海上霸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同盟关系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说到底就是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中国实力迅速崛起背景下，通过借助军事同盟及安全伙伴的责任分担，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国历来反对霸权，主张地区安全应该由大家协商共同维护，不赞同建立在传统军事同盟基础上的排他性安全理念。早在 1997 年，中国就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强调各国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相互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⁶2014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中国首次提出亚洲安全观，主张亚洲国家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⁷

当然，除了竞争性的一面，中美两国作为在亚太及全球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彼此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合作领域及利益交汇点。在维护亚太稳定与繁荣方面，两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在气候变化、朝核、伊核、反恐、防护散、打击海盗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等方面，两国也在进行着广泛合作。此外，两国经贸关系密切、高层互动频繁、人文交流深入广泛，双边互动十分紧密。这些利益交汇点和合作，是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两国竞争走向失控。

二、中美竞合下的澳大利亚对华矛盾心态

澳大利亚地理上紧邻亚洲，甚至被视为亚洲一员，但在文化传统和心理认同上，一直自视为西方国家。与亚洲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疏离感，导致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在安全上积极谋求英美国家的庇护。在二战前，澳大利亚在安全上长期依

赖英国，二战后，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被视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经济上，二战后澳大利亚一直仰仗美国的资金、市场和技术。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来源国和海外市场。⁸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交往日益紧密。中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和海外市场，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澳大利亚首次面临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脱钩现象。⁹

面对“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仰仗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剥离，澳大利亚人心理上充满矛盾。一方面，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认为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澳大利亚是个机遇，澳大利亚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澳大利亚政府在 2012 年发布的一份题为《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政策白皮书》中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强劲崛起，将给澳大利亚的采矿业、工业、农业及教育、旅游等服务行业带来无限商机。¹⁰澳大利亚著名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2012 年的民调显示，70%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资源的强劲需求是澳大利亚避免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该研究所 2013 年的民调显示，7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当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为重要的经济伙伴，

而认为美国是最重要的仅占 16%。¹¹2014 年的民调显示，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 60%，是历史上最好时期。另外，有 31%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是澳大利亚在亚洲的最好朋友，远超过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日本（28%与新加坡（12%）。¹²

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对与中国经济交往过密也心存疑虑，特别是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在澳投资感到不安。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自 2009 年以来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许可过于宽松。¹³在 2012 年的另一项民调中，54%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的矿产及农业公司应该掌控在澳大利亚人手中，51%的人认为，中国源源不断的投资最终会导致很多澳大利亚公司都被中国人控制和买走。¹⁴为“管控”中国投资，澳大利亚财政部于 2008 年初制定了专门针对外国国有企业对澳投资的“六条国家安全标准”，加大了对来自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审核力度。澳大利亚财政部官员甚至私下向美国透露，新标准就是要“对中国在澳大利亚资源部门日益增长的影响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在这一新标准下，仅 2008 年 4 月至 2010 年 6 月间，就有四起中国对澳矿产部门投资被否决，包括曾轰动一时的中国铝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失败案。2012 年 3 月，澳大利亚政府又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否决了中国华为公司竞标澳大利亚国家宽带网络的合同。¹⁵

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的顾虑，还有一个未言明的深层次

原因，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怀疑。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但在澳大利亚人的内心深处并未完全改变对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与成见。在澳大利亚人看来，中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曾经对东南亚国家奉行“输出革命”外交，在冷战的记忆还未尘封之际，这一事实依然有可能让澳大利亚对中国存有戒心。其次，对于澳大利亚那些深谙“现实主义”思维的决策群体来说，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会自然地让他们想起历史上崛起大国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权力冲突图景。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正在改变澳大利亚人熟悉的地区秩序，未来的亚洲充满不确定性，澳大利亚对此深感忧虑。中国迅速崛起和美国优势的衰落，“将意味着自越战以后形成的亚洲秩序的终结。……这同时也预示着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对亚洲海洋控制时代的终结，而这正是澳大利亚建国以来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¹⁶最后，澳大利亚人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行为显得“盛气凌人”，中国似乎不愿意通过国际制度约束自己，不愿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在中国军事力量迅速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外交政策行为加剧了澳大利亚人的担忧，认为崛起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试图挑战现存地区秩序。¹⁷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2014 年的民调显示，48%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在未来 20 年中国有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高达 85%的人认为，一旦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将对澳大利

亚构成威胁。¹⁸

对中国的这种担心与疑虑，导致澳大利亚更加希望在安全上拉住美国，借助美国力量平衡中国的影响。澳大利亚认为，美澳同盟是澳大利亚安全的基石，特别在亚洲秩序面临转型背景下，这一联盟对确保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尤为重要。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澳大利亚积极支持和配合，同意北部达尔文军港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轮训场所，并于 2014 年签署了《美澳驻军协定》，落实美军在澳轮训，强化双边军事合作。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2014 年的民调显示，78%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美澳军事联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相当重要，85%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在未来五年里澳大利亚可以继续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78%的人认为在未来十年里澳大利亚可以继续依赖美国。¹⁹澳大利亚著名记者和媒体评论员格莱哥·谢里丹（Greg Sheridan）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利用美澳同盟增强与中国打交道的分量。澳大利亚“科科达基金会”创始人罗斯·巴比奇（Ross Babbage）更露骨地指出，尽管澳大利亚在与中国合作共事方面拥有持续的利益，澳大利亚能够也应该在经贸、反恐和防扩散等方面与中国继续合作，但是澳大利亚不能忽视中国军力的迅速发展及其对西太平洋安全局势的潜在威胁。澳大利亚应该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抵消和平衡中国军力的威胁性发展，遏阻中国的军事冒险，恢复地区信心。²⁰

然而，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并非全然没有风险，因为这可能招致中国的不快。2011年，针对美澳达成驻军协定，中国外交部明确表达了不满情绪：“中美和中澳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进一步发展双方互利合作，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向中方表达了这种意愿。我们认为，各方应采取切实行动，增进互信，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中方不搞军事同盟，对外政策有自己的理念，那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包括亚洲国家的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同时提醒，“在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促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和焦点的背景下，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是不是合适宜之举，是不是符合地区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值得商榷。”²¹

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学者也反对澳大利亚与美国在军事上走得太近，认为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样做并不能确保澳大利亚的安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指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仅是时间问题，美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的主导优势将日益下降，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会更大地依赖于中国，因此澳自身及美国都必须进一步“适应”中国的崛起，特别是认真对待中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他认为，澳大利亚应该积极游说美国，让美国接受与中国在亚洲分享领导权，撮合中美两国在亚洲

和平共处，避免中美关系恶化和出现对抗。“我们不想生活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但也不愿忍受中美对抗的挤压”。如果中美关系恶化，那么澳大利亚面临的风险将是巨大的，澳大利亚与任何一方站在一起都将“危险而代价高昂”。²²

如何兼顾澳大利亚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如何在中美之间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关系，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如何尽可能拓展澳大利亚的外交与战略空间？这些都是澳大利亚面临的外交难题。

三、 澳大利亚的对华对冲战略

为摆脱战略困境，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奉行一种较为精致的对华对冲战略，在深化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注意加强与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关系，同时大力发展与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的经济安全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建设，拓展外交空间，全面维护澳大利亚的经济与安全利益。

第一，继续大力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自 9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经济维持了长达 20 多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这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是绝无仅有的。尽管促成澳大利亚二战后最长的经济景气原因多种多样，但来自中国的经济贡献功不可没。这从一组经济数据中可以得到直观说明。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1990-2013 年间，中澳双边贸

易由不足 31 亿澳元猛增到 1508 亿澳元，增长了 50 多倍。中国由澳大利亚的第 10 大贸易伙伴跃居第 1 大贸易伙伴。自 2009 年以来，中国连续五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商品出口国和最大商品进口国。2013 年澳大利亚对华贸易总额相当于日本、美国及韩国（分别为澳大利亚第二至第四大贸易国）对澳贸易额之和，占澳大利亚外贸总额的 23.3%；对华出口额则比对日本、韩国和美国三国出口总额还多 17%，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 31.9%。²³从中澳两国的贸易构成来看，近年来，澳大利亚 50% 以上的矿产出口到中国，而矿产出口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 40% 以上，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支柱，也是澳大利亚的财政支柱。2013 年，澳大利亚铁矿出口增长了 27.6%，达到创纪录的 695 亿澳元，其中向中国的出口额高达 526 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全部铁矿出口的 75% 以上。²⁴正是由于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高度重要性，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对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十分看重。新一届保守党政府上台后，阿伯特总理积极表示，要大力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誓言要在一年内结束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14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澳期间，两国宣布实质性完成中澳自贸区谈判，进一步提升了两国经贸关系，受到澳大利亚媒体及各界的高度评价。2015 年 3 月，澳大利亚在经过数月的犹豫和权衡后，最终决定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两国经济合作跃上新台阶。

第二，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军事及人文交流。在西方主要大国中，澳大利亚与中国一直维持着较好的政治关系。自1972年中澳两国建交以来，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迅速，高层交往较为频繁。2013年，在工党吉拉德总理任职期间，中澳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了两国总理年度定期会晤机制，极大提升了两国政治关系。同年中澳两国启动了首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外交与战略领域的沟通与磋商。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澳期间，两国一致同意将中澳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政治关系进一步深化。

澳大利亚还注重发展与中国的军事关系。1997年，中澳两国防务部门建立了防务战略磋商机制，截止2014年双方已经举行了17次防务战略磋商，双方在作战、训练、教育、后勤及海上安全合作等方面举行了务实合作，并保持顺畅的战略沟通，成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一环。

在人文交流方面，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总数达20多万。中国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外游客来源地，每年有超过100万的中国游客到访澳大利亚。在习近平访澳期间，中澳两国决定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澳大利亚政府宣布，自2015年起在华实施旨在加强两国学生交流的“新科伦坡计划”，支持建立中澳省州负责人交流合作机制。澳大利亚希望，通过

与中国保持较为密切的政治、军事及人文关系，一方面可以部分打消中国对澳大利亚保持与美国紧密军事同盟关系的疑虑，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也可借此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某种桥梁作用，引导中美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降低中国崛起及中美战略竞争可能对澳大利亚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积极发展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等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尽管澳大利亚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澳大利亚并不想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除了与中国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外，澳大利亚还大力发展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等在亚太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在澳大利亚的对外经贸关系中，日本和美国是其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分别占据其外贸总额的10.9%和8.5%。²⁵美国、新加坡和日本还分别是其主要投资来源国，2013年分别占据澳大利亚吸引外资总额的30%、12%和8.7%。²⁶澳大利亚还是较早与美国签署自贸区协定的亚洲国家，并率先加入了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倡议（TPP），是首批TPP谈判国。2014年，澳大利亚完成了与韩国及日本的自贸区谈判，并加速启动与印度的自贸区谈判。对东盟主导的“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贸区倡议，澳大利亚也持积极态度，参与区域自贸区的谈判。澳大利亚成为少数几个与中、美、日、韩等主要亚太经济体完成了自贸区谈判，又同时参与了TPP及RCEP谈判的亚太国

家之一，显示了澳大利亚对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的高度重视及经济外交的娴熟。

第四，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一直被视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对外防务关系。在中国崛起和亚洲权力变动背景下，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关系更被视为平衡中国影响、确保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基石。澳大利亚 2009 年的国防白皮书如此形容美国对澳大利亚国防的重要性：“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的战略观及防务计划一直立足于全球权力分布，特别是立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优势，美国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一直扮演着稳定器角色”。²⁷该白皮书强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澳大利亚最为重要的防务关系，是澳大利亚战略态势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美国的）同盟使我们能够获得重要的物资、情报、研发及通信系统，从同盟中获得的技术与专业知识极大地增强了澳大利亚国防军的能力”。²⁸工党吉拉德政府在 2012 年发布的澳大利亚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再次强调，美澳同盟是澳大利亚最为重要的安全关系，是澳大利亚国防及安全合作的基石，“同盟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防务层面，还提升了我们的安全及繁荣。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及繁荣不可或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²⁹正是基于对美国军事同盟的重视以及对美国崛起的潜在担忧，澳大利亚政府对奥巴马推行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积极欢迎，同意 25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在澳大利亚北部军港轮训；加强两国在情报、太空、军事研发、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14年8月，两国签署了《美澳驻军协定》，这项长期协定涉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以及美国空军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轮流驻扎安排。³⁰据媒体报道，新签署的《澳美驻军协定》将在未来25年的时间里，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空军在澳大利亚北领地进行“训练”和驻扎，澳美将加强弹道导弹系统的合作。³¹

在强调美澳军事同盟对维护澳大利亚安全重要性的同时，澳大利亚也注重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强调，在防御澳大利亚本土及捍卫澳大利亚独特的战略利益方面，澳大利亚依靠自身军事力量，同时确保能够与其他盟友一起捍卫共同战略利益。为履行这些使命，澳大利亚需要建立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如反潜能力、海上防空能力，空中优势，战略打击能力，以及情报监控和侦查能力和网络战能力。³²阿伯特政府上台后，表示将增加澳大利亚军事开支，将军费逐渐提升到占GDP的2%左右，更新澳大利亚的海军及空军装备力量。

第五，加强与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双边军事交流。积极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也是澳大利亚应对亚洲权力变化和确保自身安全的重要举措之一。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逐渐加强了与日本的安全联系，将日本视为“澳大

利亚在亚洲最紧密的朋友和最强有力的支持者”。³³新世纪以来，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越来越制度化。2007年3月，澳日两国发布安全合作联合声明，表示要加强两国在军事演习、训练、人道主义救助等方面的合作。2010年双方签署了《采购和跨军种协定》(ACSA)，根据协定双方加强在联合军事演习、训练及人道主义救援及其他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2012年两国还签署了《信息安全协定》(ISA)，促进两国战略信息交流与共享。此外，2007年澳大利亚与日本启动了外长和防长的“2+2”部长级会谈，截至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5轮会谈。在2014年的会谈中，双方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彼此的防务安全合作，特别是推进联合军演，努力提高两国军事上的兼容性。双方还表示要加强在救灾、人道主义救援及联合国维和活动领域的合作。此外，澳大利亚还考虑加强与日本军事技术合作，特别是在潜艇技术领域的合作。据报道，澳大利亚正在考虑更新其服役潜艇，日本很有可能成为澳大利亚新一代潜艇的技术合作方。³⁴

澳大利亚还注意加强与印度的政治与防务关系。2008年以来，澳大利亚主动接近印度，扩大两国之间的防务对话和务实合作，特别是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2009年，双方签署联合安全声明，确定进行合作的八个领域：防务对话、信息交流及地区政策协调、在多边论坛中的双边合作、反恐、跨国有组织犯罪、灾害管理、海上及空中航行安全以及执法合

作。2014年9月，阿伯特访问印度期间，双方签署了《和平使用核能备忘录》，澳大利亚同意向印度出口发展核反应堆所需的铀燃料和相关技术。尽管这一协定不涉及军事领域，但考虑到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对核扩散的敏感性，此举从一个侧面说明澳大利亚对发展与印度关系的高度重视。

第六，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制度建设。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还通过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制度建设来提升澳大利亚地区影响力，主动塑造有利周边环境。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东西方关系缓和及东亚地区经济起飞，澳大利亚于1989年倡议成立亚太国家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建立开放性多边贸易体系，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倡导者和发起国。尽管后来亚太经合组织在促进地区贸易一体化领域的作用逐渐被以东盟为核心的“东盟+X”模式所取代，但澳大利亚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制度建设的努力与热情并未因此减退。1994年，澳大利亚参加了首届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创始成员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安全对话与合作。2005年，澳大利亚参加了首届东亚峰会，成为首批加入东亚峰会的国家之一。通过倡导和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制度，澳大利亚不仅拓展了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也借助多边制度将中美两国“捆绑”在一起，既拉住了美国，又能更好地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

四、 中国应如何应对？

中美两国尽管在地区及全球性事务上存在诸多共同利益，进行着较多的合作，但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竞争加剧，也是不争的事实。澳大利亚作为夹在中美两个“大块头”之间的中等国家，面对中美之间竞争加剧，亚洲权力格局和秩序格局变迁以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渐行渐远，感到不适、迷茫，甚至担忧，也属情理之中。

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坚定盟友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中的一员，无论是惯性使然，还是出于文化及心理上的眷恋，澳大利亚对美国在东亚影响力的相对衰退自然会感到惆怅与失落。面对东亚权力格局的巨变，特别是对中国权力的急剧上升和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依赖，澳大利亚需要心理上的调适。

在这一东亚权力转移的过渡期中，中国应该理解澳大利亚等周边国家的感受，允许它们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时间进行心理和行为上的调适，允许它们经济上继续“搭车”，不要求它们在中美之间站队，并通过加强沟通对话，妥善处理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管控好海洋争端等举措，最终赢得周边国家的理解和信任。

首先，继续加强中澳经贸关系，允许澳大利亚继续“搭车”。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3

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 523 亿澳元，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对外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2014 年双方的贸易额虽有小幅下降，但澳大利亚对华贸易顺差仍高达 450 多亿多澳元。³⁵ 总体而言，绝大部分澳大利亚人对发展更为紧密的中澳经贸关系持积极态度和正面看法。由于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加强两国经贸关系不仅对澳大利亚有利，对中国也有利。中国应继续让澳大利亚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通过紧密的经贸联系构建中澳之间的利益共同体。

其次，提升中澳政治与安全合作。加强两国的高层政治对话，拓展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增加两国政治互信，特别是缓解澳大利亚对华战略疑虑具有积极作用。此外，两国还可以在打击海盗、海上救灾、海上通道安全及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加强合作，努力构建中澳之间的安全共同体意识。中国要积极利用中澳两国既有双边及多边互动机制，同时善于开拓智库交流及媒体对话等新渠道，全面阐释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周边秩序主张和中国对澳政策，增进彼此了解，加强战略和政策沟通，减少其对华战略疑虑。

再次，推进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与战略沟通。作为美国的坚定军事盟国，澳大利亚发展对华关系，无疑受到来自美国的影响。如果中美关系剑拔弩张、尖锐对立，澳大利亚将会感到无所适从，甚至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³⁶ 因而加强中美在亚太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更为紧密的中澳

关系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中国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推进与美国亚太良性互动：第一，在战略层面，保持两国高层领导人的定期会晤，就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地区及全球秩序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交流、磋商与协调；增强两军之间的高层交流与互访，加强战略沟通，减少战略误判，增进战略互信；第二，在技术层面，拓展中美在经济、安全及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危机管控的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双边及多边机制建设性管控分歧与矛盾，使中美能够在亚太地区和乎共处和进行良性竞争。

最后，妥善处理周边海洋争端。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争端有逐步升级的危险。由于海岛主权及海洋权益的内在刚性，各声索国不大可能在既有立场上大幅让步，因而维持现状，通过谈判与妥协，找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才有可能最终走出争端僵局。中国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大战略视角来审视海洋争端问题，平衡好海洋维权与维稳关系。对中国来说，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与和谐的大国关系，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梦想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要谨防“海洋陷阱”和崛起冲动，要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妥善处理周边海洋争端，无疑有助于塑造有利的周边环境及大国关系。

注释：

¹ 胡锦涛:《增进友好互信促进共同发展——在越南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日。

²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248页。

³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⁴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⁵ 《习近平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

⁶ 《中国向东盟论坛提交新安全观立场文件》,《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

⁷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⁸ Nick Bisley, “Australia and Asia’s Trilateral Dilemma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Asian Survey*, Vol.54, No.2, March/April 2014, pp.297-298.

⁹ James Reilly, “Counting on China? Australia’s Strategic Response to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2012, p.370.

¹⁰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Canberra: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October 2012, pp.114-128.

¹¹ Alex Oliver,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2013: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Sydney: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June 2013, p.6.

¹² *Ibid*, pp. 5-19.

¹³ *Ibid*, P.19.

¹⁴ Fergus Hanso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the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12, 转引自:Weihua Liu and Yufan Hao, “Australia in China’s Grand Strategy,” *Asian Survey*, Vol.54, No.2, March/April 2014, p.388.

¹⁵ James Reilly, “Counting on China? Australia’s Strategic Response to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2012, pp.388-389.

¹⁶ Hugh White, “The Geo-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Growth,”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Wing Thyee Woo, eds., *China’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Economic, Geo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CT 0200, Australia, 2009, p.101, 转引自, 喻常森:《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4期,第135页。

-
- ¹⁷ 【澳】马必胜：《澳大利亚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65-67页。
- ¹⁸ Alex Oliver,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2014*, Sydney: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June 2014, p.14.
- ¹⁹ Alex Oliver,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2014*, Sydney: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June 2014, p.14.
- ²⁰ Ross Babbage, "Australia's Strategic Edge in 2030," *Kokoda Papers*, No. 15, February 2011, pp.4-119.
- ²¹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举行例行记者会，2011年11月16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jzhsl_602247/t877838.shtml。（上网时间：2015年4月2日）
- ²² Hugh White, "Power Shift: 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Quarterly Essay* 39, September 2010, p.62; 赵明昊：《澳大利亚的选择》，载《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5日。
- ²³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s Dire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rade-Calendar Year from 1987 to Present," <https://www.dfat.gov.au/publications/stats-pubs/trade-time-series-data.html>。（上网时间：2015年1月25日）
- ²⁴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Composition of Trade Australia 2013*, June 2014, pp.1, 12-14, 100.
- ²⁵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Composition of Trade Australia 2013*, June 2014, p.1.
- ²⁶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ustralia 2013*, October 2014, forward, p.5.
- ²⁷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Defense White Paper 2009*, pp. 30,32, 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09/doc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上网时间：2015年1月30日）
- ²⁸ Australian Defense Department,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Defense White Paper 2009*, pp.93-94.
- ²⁹ Australian Government, *Strong and Secure: A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2013, p.22.
- ³⁰ <http://www.defenc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2910>。（上网时间：2015年1月30日）
- ³¹ 《澳美签署新防务协定，允美空军在澳北领地驻扎》，新华网，2014年8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13/c_126865737.htm。（上网时间：2015年1月25日）
- ³² Australian Defense Department,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Defense White Paper 2009, pp.13-14.

33 Stephen Smith, *Speech at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Tokyo, September 2012.

34 Tim Kelly and Nobuhiro Kubo, "Australia Wants New Japan Propulsion System for Its Submarines –Sources," *Reuters*, November 18,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1/18/japan-australia-submarine-idUSL3N0T241620141118>. (上网时间: 2015 年 1 月 25 日)

³⁵ 《2014 年澳大利亚货物贸易及中澳贸易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list110209.asp?qikanid=6894&title=2014%C4%EA%B0%C4%B4F3%C0%FB%D1%C7%BB%F5%CE%EF%C3%B3%D2%D7%BC%B0%D6%D0%B0%C4%CB%AB%B1%DF%C3%B3%D2%D7%B8%C5%BF%F6>. (上网时间: 2015 年 4 月 2 日)

³⁶ Hugh White, "Australia Is Now a Pawn in US-China Power Plays," *Sydney Morning Herald*, April 16, 2013, <http://www.smh.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opinion/australia-is-now-a-pawn-in-uschina-power-plays-20130415-2hvww.html>. (上网时间: 2014 年 5 月 6 日)